

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能走多远

叶南客¹, 王向伟²

(1. 南京市社科院, 江苏 南京 210018; 2.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社会学自1839年产生以来,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交锋一直不断,可以说,社会学170余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实证与反实证一路争论的历史。中国社会学继承了西方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本质特性,以定量的方法为主,专注于社会实证调查,实证主义是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但同时,同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社会学内部也存在着实证与反实证、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的二元分歧,尤其西方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陷入“社会学危机”的争论以来,中国社会学实证与反实证、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争论更加激烈,随之产生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能走多远的疑问。针对这一问题,应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当前中国的转型实际予以正确分析和回答。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实证主义道路;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2)01-0001-05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ical Positivism

YE Nan-ke¹, WANG Xiang-wei²

(1. Nan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8, China;

2.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Since 1839, the debate between positivism sociology and anti-positivism sociology has started. We can say that the 170-year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s the history of argument between them. Chinese sociology has inherited the positivist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sociology. Positivism i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focuses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like western sociology, there are also the 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mpirical sociology and anti-empiric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ology. Especially in the mid 1960s, since the argument of “western sociology crisis”, the debate has become more heated; resulting in how far Chinese positive sociology can go.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provide a correct analysis and 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ecial feature of sociology and the current reality of China’s transition.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ogy; positivism road; quantitative research

当前的中国社会学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大约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30年代

末40年代初,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的根本特点是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居主导地位,正是从这一时期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叶南客(1960-),男,江苏涟水人,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南京市社科联主席、党组书记,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起,在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带动和影响下,美国社会学开创了注重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注重社会调查的传统。社会调查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特点之一,从这一点上讲,同样注重社会调查的中国社会学也应属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事实上中国社会学自产生之日,便一直坚持实证主义的发展道路。而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出现了社会学危机,尽管危机有着深刻的根源,但其直接的表现却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危机。由于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高度关联性,因此,有人不免担心中国社会学是否也会走向危机,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能走多远。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当前中国的转型实际予以正确判断和解答。

一、社会学产生以来的二元对立及西方社会学危机

(一)社会学产生以来的二元对立

自1839年孔德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迄今为止社会学已经经历了170余年的发展历程。170余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奠基与形成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帕森斯王朝”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群雄割据”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的综合尝试阶段。第一阶段通常被我们称为社会学发展的“古典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社会学形成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理解主义、批判主义三大传统,三大传统影响整个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之后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实际上一直处于这三种传统的张力之中。一开始,孔德便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定为实证科学,号召按照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研究社会,并曾将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加之之后斯宾塞、杜尔克姆、帕森斯等大师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影响,实证主义一直处于社会学的主流地位,被视为社会学学科独立性的标志。古典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大部分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更为社会学学科独立性的建设做了更为伟大的贡献。

但实证主义作为社会学的独立性学科并没有被所有社会学家普遍认同,以理解和批判为范式来

研究社会的流派一直坚持反实证的立场。实证和反实证社会学家的分歧,逐渐产生了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这一社会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元对立”。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两种范式针对何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理应采用的研究方法展开争论,并各自按照自己的范式立场对所认为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和解释。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对立,又衍生出了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经验与抽象、定量与定性等多组二元对立。

(二)西方社会学危机及其本质与根源

虽然存在实证与反实证的分歧,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分歧,但截至20世纪60—70年代,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一直是西方社会的正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产生之初孔德的努力、古典时期大部分社会学家主张实证主义、杜尔克姆对社会学学科独立所做的实质性贡献以及芝加哥学派的成功外,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对整个西方社会学的影响更巩固了实证主义社会的正统地位。

在社会学发展的古典时期,虽然实证主义是主流,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在整体上还是呈现一种分散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分散的局面,以利于社会学学科整体性的发展,帕森斯整合古典时期几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学理论,成功建立了“一般行动理论”,社会学的学科整体性和解释力空前提升。但随着其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入,帕森斯偏离了最初综合的初衷,思想越来越接近孔德、斯宾塞和杜尔克姆等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在其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之后,帕森斯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了。

由于“结构功能主义”创立时,西方社会的中心已由欧洲转向美国,而当时美国的社会状态又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功能解释大致吻合,因此,“结构功能主义”一经确立就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西方社会学从此进入了“帕森斯王朝”时期。“结构功能主义”成就的不仅是社会学的“帕森斯王朝”,也使得由它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从古典时期的主流地位,一跃成为西方社会的正统。在“帕森斯王朝”时期,实证主义社会学天下一统,其它反实证的社会学流派大部分依附于“结构功能主义”,靠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缺陷而形成和演进,此时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

也表现得最完美。

但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力日趋衰弱,霸主地位不断动摇。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验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主义”、“社会交换理论”以及“批判理论”等反“帕森斯主义”的流派开始繁盛,“结构功能主义”创造的“帕森斯王朝”一去不复返,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入“群雄割据”时代。“群雄割据”的状态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认识到,长期的“割据与纷争”不利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也不利于人们科学完整地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种试图综合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新的综合尝试开始了,但可惜的是,综合努力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像帕森斯那样的“一元综合”,而是形成了多种综合理论并存的“多元综合”的局面,西方社会学流派纷争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纷争的外在表现,给人们的一种感觉就是社会学学科整体的混乱状态。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虽然,这种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并不一定会妨碍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但同时理论上的长期分离与不一致无论如何也会有碍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整体面貌的出现”^[1]。在“帕森斯王朝”日渐没落的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首次对社会学进行批判,从此西方“社会学危机”的声音在西方社会学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便不绝于耳。1970年,古尔德纳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对处于当时主流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批判。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专门以“社会学危机”这一问题为主题在社会学家中展开讨论。霍罗维兹在写《社会学的瓦解》一书时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渐渐变得枯燥无味了。安东尼·吉登斯在其《为社会学辩护》一书的第一章第一句话便感慨道:“社会学出现了其它学科没有出现的混乱。”^[2]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社会学危机。

归结西方社会学危机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一直没有统一和明确。西方社会学流派中,有以模糊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有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的,有以个人行动为研究对象的,有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个人日常生活等为研究对象

的,截至“危机”到来之时,西方社会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研究对象。

其次,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存在着定量与定性的分歧。实证主义社会学一直秉承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反实证的社会学则一直坚持定性的研究方法。最终,西方社会学也没能在研究方法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最后,西方社会学包括实证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功能需求相对下降。社会学是一个时事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密切关注新鲜社会热点,而美国社会在逐渐完成转型时,社会热点涌现的速率赶不上社会学的研究需求,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实证社会学研究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随着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相继结束,西方社会学由于失去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热点问题,而在较繁盛时期显得无所事事,西方社会学的学科价值性出现危机。

前两点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西方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危机,因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被人们认可,必须有两个基本的要素: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杜尔克姆为社会学界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也是在杜尔克姆时期西方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或整体性表现得最完美的原因),而西方社会学在这两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最终没有达到统一。第三点原因则可以归纳为西方社会学的学科价值性危机。因此,西方社会学的危机表面上是“结构功能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危机,但本质上是西方社会学学科独立性和学科价值性的危机。而西方社会学产生以来,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长期分歧是其危机的总根源。

二、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与反实证、定量方法与定性研究之争

自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成《群学肄言》,把西方社会学引入到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也存在着实证与反实证、定量与定性的争论。但争论归争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始终是实证主义的,这主要是由于:首先,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经典,中国人一开始接触的社会学思想就是实证主义的;其次,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初期,正是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鼎盛时期,

中国社会学形成之初一直受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的熏陶;最后,从西方社会学传入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变革、革命、转型的时期,激烈的社会转型需要实证主义的高效社会调查来研究、解释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学天生是实证主义的,重视实证调查,方法上以定量的分析为主。

中国社会学以实证定量为中心,并不表明没有反实证的声音。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不断地被译入,中国的社会学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非实证的社会学在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时同样显示出了一定的功能价值,因此便不乏支持拥护者。实证与反实证的争论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里同样不可避免。但西方社会学的二元分歧除了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实证与理解外,还存在于抽象与经验、均衡与冲突、宏观与微观的对立,与这种情况相比,中国社会学的二元对立则只集中于定量与定性、实证与理解的分歧,即研究的方法范式的争论。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已经有了一个“社会学要坚持实证”的共识,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在实证主义调查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更好地运用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中国社会学走实证主义道路的立场是清晰的。这决定着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发展道路。

三、中国社会学的调查实践与理论建设之争

中国社会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实证的社会调研立命,如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先生主导的小城镇研究,以及当今中国转型期的流动人口研究、弱势群体研究、新农村建设研究、移民研究等热点问题,大都是运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适应了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需要。实证的社会调查几乎可以与中国社会学划上等号。社会调查广泛深入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却进展缓慢,由此就产生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与调查研究的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争的深层次延续。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目前还处于初期的外部引进与内部积累阶段,建设的主要形式是翻译西方主要理论作品,自身的理论建设成果不多。社会

调查研究只是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拿来研究自身的问题,方法只是工具,人人都可以用也都易于掌握,而真正的社会学本土化还在于理论的建设。如何处理好理论建设与实地调研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由中国的实际来决定。这也是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能走多远的一个因素。

四、立足社会学的学科特性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摆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社会学理应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这是其区别于其它人文学科、彰显其学科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孔德在提出社会学之初,就明确了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后来的杜尔克姆更是为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社会学界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此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因此,坚持实证就是坚持社会学,实证是社会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真正所在。一些反实证的社会学传统没有按照孔德和杜尔克姆界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去研究和解释现象,最终要么是在对象的界定上过于抽象而与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界限不清,要么是在对象的界定或方法的选取上犯了“还原论”的错误,而变得与心理学界限模糊,最终导致了社会学学科独立性的丧失。这是西方社会学之所以会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

截至目前,中国社会学较好地保持了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面对定量与定性的争论,我们应该跳出学科建设的层面去认识。现象呈现的状态——质或量,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互区分的本质,也最终决定了我们实地调研所应采取的手段,对象是以量的形式呈现的就采用定量的方法,若以质的形态出现则应该用定性的方法予以分析,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的选择不能主观。同时,质和量对事物而言原本是混合在一起的,有时是分开呈现的,但也并不是没有对方,而只是以质或量的其中一方为主。因而,可以以定量或定性为主,但绝不可能、也不允许缺少另一方,在实地的调研中不能厚此薄彼。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以量的形式大规模涌现,问题的层出不穷需要我们以定量的分析方法为主,高效地研究和解释现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以

定性的方法作补充。

至于理论建设与调查实践的关系,我们应着重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来分析。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有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我们不应急于理论的建设,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以1978年恢复社会学的建设为界,中国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进程只有三十余年的时间,三十余年对于复杂、系统的理论建设来讲过于短促。因此,我们应该给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或本土化以时间。目前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应以积累为主,把精力主要放在创立概念和命题上,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在对待理论建设与调查实践的关系上,我们应以注重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调查为主,以理论的基础建设为辅。

因此,社会学实证的学科特性和中国转型期的实际,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必须以实证和定量为发展方向。面对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路能走多远的疑问,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转型期结束(仅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2050年为界限)后,随着其它理论的发展,最主要是社会热点问题的减少,中国社会学也有出现价值型危机的可能,中国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发展传统可能会如当今的西方社会学一样面临发展的困境。但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社会学的实证

主义传统走向了危机,因为如前所述,危机的实质在于社会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危机,只要我们坚持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特性,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就能一直走下去。

总的来讲,社会学之所以是社会学,就在于它的实证性。为了保持社会学的这一学科独立性,西方和中国社会学都应按照实证主义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学要保持好自己的独立性,必须要做好本土化建设,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性。就如同中国在经济上与西方经济接触过深而遭受2008—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一样,若不加快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提升自己的独立性,中国社会学也同样会在西方社会学危机的影响下遭受牵连而面临学科危机的风险,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也可能由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走向尽头。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
- [2] 安东尼·吉登斯. 为社会学辩护[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